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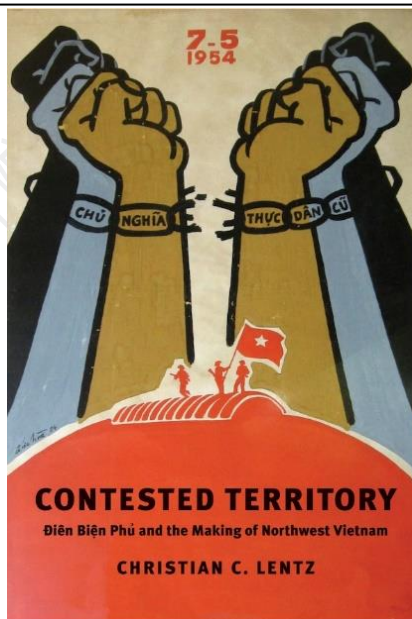
区域动态（东南亚）

【区域动态】必争之地：奠边府与越南西北部的形成

编者按：阅读过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的著作《战争的余烬》的读者，想必都会对其中描写的奠边府战役印象深刻。1954年，越南人民军在这个位于越南、老挝边界附近的村庄投入了大批人员以运输大炮、弹药等物资，并成功地用炮火压制了要塞中的法军，最终赢下这场战役，迫使法国放弃重建印度支那殖民统治的想法。

关于奠边府战役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对于这个地区本身的研究却极其有限。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地理学及历史学副教授克里斯蒂安·C·伦茨（Christian C. Lentz）则独辟蹊径，在他的新著《必争之地：奠边府与越南西北部的形成》（*Contested Territory: Diên Biên Phủ and the Making of Northwest Vietnam*）中，伦茨关注越盟如何动员当地的少数民族群，如何在这片远离京族人传统聚居区的土地上完成繁重的后勤运输工作，并最终如何将其纳入越南国家的地缘机体之中。在探讨越南国家建构过程的同时，本书也反映了西方越南研究的一种态势：反对“国族一体”的刻板叙事，致力于描绘一个充满流动性、多样性和地区特性的越南。《必争之地》获2021年哈里·本达奖。

本期刊发的书评、对话源于2019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年会上关于《必争之地》的小组讨论。这些讨论内容后来发表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书评》（*The AAG Review of Books*）上。我们从中挑选、编译了加拿大约克大学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陶娥（Nga Dao）、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全球研究主任杰米·吉伦（Jamie Gillen）的评论，以及作者伦茨的回应，以飨读者。其中陶娥的评论结合自己的经历对书中内容进行了回顾，杰米·吉伦的书评则将本书置于西方越南研究的语境中加以解读。



陶娥的书评:

克里斯蒂安·伦茨的《必争之地》是一部关于越南历史地理的生动而出色的著作。我把这本书推荐给所有有志于了解国家建构关键时期的人，这一时期与当代越南息息相关。重要的是，该书揭示了“从个体和本土社会运动到军队、政府政策和跨国经济流动”等多个层面关于领土形成不为人知的历史（第 243 页）。

《必争之地》在阐述越南国家领土的建立时，着眼于革命期间以及 1954 年奠边府大捷前后的地方斗争。其间，伦茨讨论了新成立的越南民主共和国（DRV，北越）为调动和控制国家西北部资源所采取的种种策略。伦茨在整本书中巧妙地使用了通猜·威尼差恭的地缘机体（geobody）概念，使得国家更人性化，同时也使它在其特定背景下易于理解。伦茨通过以下方式帮助读者理解这一过程：揭示权威关系的构建和分层，分析资源生产和消费的政治，以及揭示社会不平等和复杂的族际关系。本书结合了丰富的历史细节以及对领土、国家控制和“监控”的有趣的概念化，分析了越南在将西北地区及其人民融入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斗争。通过挖掘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1946-1954 年）中的故事、档案和史料，伦茨重现了越南历史上令人难忘的时刻。

伦茨令人信服地展示了北越的国家建构是如何将越南领土置于地方利益和议程之中（第 65 页）。我尤其喜欢伦茨关于后勤保障应被视为将西北融入越南领土的关键路径的分析：

将军后勤管理应用于国家对该区域事物和人民的了解。我自小就非常熟悉“监控（watching over, theo dõi）”的概念，在越南语中，它有着照护与监视两层含义。因此，人们“被监控”的经历让我感到不舒服，也很有共鸣。我也很欣赏伦茨在分析国家建构过程时引入的性别视角。例如，他谈到妇女参与到“民工（dân công）”及其他北越民用劳动项目中，如何在挑战着父权制传统的同时，也给沱江地区的妇女带来新的风险和困难。

阅读《必争之地》加深了我对这个美丽地区的了解。伦茨探讨的是革命及其后果，而我的工作重点则是1954年后的越南西北部（Tây Bắc）。在过去的十五年里，我亲眼目睹了发展计划和项目如何改变该区域的地貌，同时捆绑着它越来越向“中心”靠拢，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每年持续几周到几个月的对该地区的访问中，我见证了西北部的人民和资源如何被囊括进“国家利益”。从国家建构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历史时期——伦茨关注的1945至1960年以及我关注的2004至2019年——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尤其是在政治逻辑、经济重点和环境影响等方面。正如伦茨所强调的，西北不仅是国家形成之初的战略地区，而且始终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在过去70年间，将西北高地人民纳入国家发展议程的目的有二：发展这些山区（连同土地及其资源）既有利于扩大国民经济增长，又有助于对领土施加政治控制。今天的西北部以水电、采矿、工业化和橡胶种植园等经济活动而闻名——所有这些都是不同形式的剥夺和资源汲取。这种发展还伴随着森林采伐、族群冲突、流离失所、水土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失衡，而这反过来又大大促进了该地区社会和生态风貌的不断形塑和重塑。例如，山罗省、莱州省、奠边省以及和平省的水电开发已使数十万人流离失所。与此同时，数千公顷的耕地和森林改造成橡胶种植园，其中也包括前面提到的为水坝让路而被重新安置的人们迁居的地方。

.....

尽管我非常喜欢阅读这本书并了解西北在其历史关键时期的情况，但我不禁希望伦茨能收录一些既不是泰族精英也不是京族干部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不被包含在正式档案中，而是来自经历过这一时期并对所发生的事情有不同看法的人。例如，我记得我父亲曾跟我讲1950年4月到1951年6月的这段时间，在革命战争期间，他在越北农业和农村政策部（Nha Nông Chính Việt Bắc）与克木族和泰族村民一起生活和工作的故事。同样渴望独立的他们向他讲述了他们的土地和文化，激发了他对西北部的热爱。他的美好的回忆也培养了我同样的情感和志向。伦茨对泰族、克木族和赫蒙族在这一国家建构的特殊时期遭受的连年饥荒的详述也让我想起了我父亲给我讲的一个故事。那时，京族干部和大部分村民除了南

瓜外，几乎没什么食物。他们仅有的一点大米是留给小孩和老人、病人吃的。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其他人，连续几个月每顿饭都吃南瓜。因此，由于父亲对南瓜的厌烦，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南瓜从未出现在我家餐桌上！尽管我父亲的许多故事都是关于村民对“革命”和像他这样的革命者的长期支持，但我总能在他身上找到自相矛盾的论据。我记得他谈到西北部“自治”的必要性以及让泰族人保留自己的语言并让泰族儿童在学校学习泰语的重要性，但他同时也说西北部是越南——我们的“祖国（Tổ quốc）”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我的记忆中，西北地区的本地人庆祝越南独立日比春节更喜庆热闹，这可能出于他们对融入“国家”的感激之情，也可能由于政府的长期宣传。在未来的研究中，深入、实地挖掘这些真实的故事，必将为西北融入越南这一复杂过程提供更细致的理解。

总之，作为一个在西北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人，我很欣赏伦茨对这一地区历史的深刻理解。尽管这本书只聚焦于最终将西北并入越南领土的国家建构工程的开端，但它构筑故事的方式让读者好奇这一过程是否、何时结束。而实际上，这个过程从未真正结束，我认为它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杰米·吉伦的书评（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地理学系助理教授）

越南研究专家和评论员似乎总是通过宣称“越南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场战争”，来让“天真无知的公众”感到羞愧。¹我过去也曾拍着胸脯这样说，认为越南在公共舆论中被误读，也在学术上被错误地概念化了。然而，我最近改变了主意：我现在相信越南是战争，而非一个国家。有大量证据，包括本书中的内容，表明了越南在与自己进行永久的战争。社群互相争斗，家庭互相争斗，村里的拳头紧握，种族和阶层的暴力分裂根深蒂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伦茨的新作《必争之地：奠边府与越南西北部的形成》中，种族和空间的冲突被分离出来，然后重新组合成一副松散且不相契合的拼图，即现在被称为越南民族国家西北地区的部分。换句话说，伦茨书中的公开观点是，通过检视其领土边界内的一个非常小的地方奠边府，来质疑一个一成不变的“统一的越南”概念。奠边府曾经历了地狱般的浩劫，后

¹ 此处吉伦指过去很多西方民众对于越南的认知完全来自于越南战争，而很多专家在试图告诉公众越南是一个复杂、立体的国家，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被动参与者与受害者。——编者注

来成为越南主权和全球反殖民抵抗运动的标志性代表。他更含蓄的一个论点是，在越南进行的影响最深远的战争是越南人强加于自己的永无止境的战争。接下来，我通过提炼本书的突出特征并将其置于伦茨和我深耕的两个领域来赞扬伦茨的工作：越南研究和暴力地理（the geographies of violence）。

越南研究与碎片化的越南

《必争之地》所做的是迫使读者理清在一系列竞争霸权下争夺空间和资源的各越南族群，这些霸权与我们通常认知的欧洲殖民主义时期的严格等级制度并不一致。诚然，自19世纪后期以来，法国就在奠边府所在的西北地区建立了殖民地。从那时直到1954年该地“沦入”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前，法国人可以正式宣称该地区是他们殖民统治的一部分。然而，这种说法虽然得到了一些评论者的支持，且被今天的越南政府机构广泛传播，实则是对复杂事实的草率、乏味且与实际不符的概称。换句话说，法国殖民“歌利亚”被团结一体的越南“大卫”推翻的故事被无情地灌输给我们，以至于它在同时有效地淹没了该地区的其他重要特征。² 例如，伦茨论点的主角泰族城镇居民，以前往往被刻板地描绘为法国和越南成功的国家征服的被动受害者。而在本书中，泰族人自己参与斗争，主要对象是其他少数民族，但他们也花时间来与从低地来到高地、试图“安抚”他们的京族人（越南的主要民族）周旋。他们还通过拖拖拉拉、沟通不畅、故意曲解和假装无知来打击法国殖民者。泰族对几乎所有人都怀有怨恨，甚至包括他们本民族内的群体。越南和东南亚研究界经常无意中“幼稚化”（infantilize）高地少数民族的多方面贫困，这种做法剥夺了他们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能动性、能力和发言权，而本书则尖锐地率先指出了这一点并认为这急需被纠正。我并不是说21世纪初越南西北部的生活很轻松，因为正如伦茨所指出的，饥荒、疾病、过度劳累和暴力等持续不断的挑战正与愉悦相反。但是，这些困难源于一个流动的、斗争的国家建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泰族（以及赫蒙族、克木族及其他民族）处于主导位置。

本书对越南研究的另一项新颖贡献既归功于伦茨的论点，也要归功于它的出版时间。学界对越南的研究近年来有三本重要的历史著作，它们致力于重新概念化我们对越南领土融合的了解（指Ben Kiernan 2017年出版的*Việt Nam: A History from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Christopher Goscha 2016年出版的*Vietnam: A New History*和Keith Taylor 2013年出版的*A History of the Vietnamese*）。这些书聚焦历史、篇幅长、内容丰富，由资深学者撰写，他们

² 此比喻来自《圣经》中年轻的大卫王击败巨人歌利亚的故事。——译者注

有望共同推动有关越南的辩论向前发展。我对它们进行了回顾，并在此过程中发现自己渴望更丰富的经验材料来支撑和检验这些内容的准确性。伦茨的书以及 Biggs (2012)、Dror (2018)、Sasges (2017) 和 Vu (2017) 等其他重要著作满足了这一需求。伦茨有效地说明了 21 世纪初越南北部有许多组织松散的派系，他们不亚于恶霸，但他们的残酷除了暂时的权力和领地外，并没有让他们得到任何东西。伦茨本书彻底消除了我们从前可能称之为“Vietnamese unity”的东西。

蛮荒之地

伦茨将越南领土争夺的过程置于通猜 (Thongchai, 1994) 的权威著作《图绘暹罗》(Siam Mapped) 的知识框架内，添加了对暴力物质性的细致分析——血、汗和泪水——它们伴随着任何政治主体的暂时形成。伦茨也对边疆政治文献 (Cons and Ellenberg, 2018) 作出了地理学方面的贡献，他从一个新群体的视角构建边疆的集合，这个群体不得不面对被定义为“边疆人”所给他们带来的心理裂痕。

《必争之地》的另一项贡献是它对领土化的野蛮行为的关注。正如许多政治地理学家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说领土形成的过程是有争议的、临时的，但又总是在展开。这些说法在它们对越南国家建构的描述中肯定是正确的，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描述，这就像说“肩扑搂”³是“爱的拍拍”一样。对20世纪发生在越南西北部的非同寻常的暴力含糊其词或添加修饰，可能会歪曲既造就了国家、同时也是国家所造成的野蛮行为。最后，在读完伦茨的书后，我确信，如果我被欺骗相信20世纪越南的领土暴力已经让位于和平、统一的21世纪越南，那是荒谬的。你可以说我是个愤世嫉俗者，但这本书感觉更像是序言而不是结论。

作者伦茨的回应：

无论被概念化为一场战争、一个国家或两者皆是，越南都为地理学家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有利位置来分析空间的产生，并质疑关于过去暴力的知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十年里，

³ 一种橄榄球技术动作。——译者注

越南卷入了多场战争。因此，抵抗外国入侵是越南国家合法性的强大来源，是民众的骄傲所在，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史学话语。同样地，欧洲和美国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三场印度支那战争的国际层面，争论所谓冷战中局部热战的原因和后果。然而，新的学术研究表明，正如吉伦所指出的，越南也在所有这些冲突中通过民族、地区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分裂，以及产生海外侨民而与自己斗争。这些斗争即便延续到了当下，也很少在越南公开讨论。我认为，这些斗争对建立越南民族、国家和领土的贡献与国际战争一样多。

因此，在越南挖掘一处历史与地理的交汇点，开启了关于领土及其多个尺度上紧张局面形成的有益讨论。聚焦于奠边府（地球上争夺最激烈的地方之一）领土建构中的日常斗争形式是本书的主要目标。在我看来，这要求我们修正该地的地方和区域历史，不仅要考虑到反对法国殖民的独立战争，而且要考虑当时正在成型且至今仍在发展的越南民族国家。例如，当我在奠边府的大平原进行实地考察时，一位泰族老人强调说，1954年时，那里甚至很少有人会说越南语，表明了深刻的文化和政治变革仍在当地民族语言多样且历史上自治的土壤上展开。

.....

杰米·吉伦的评论很有帮助地将本书置于越南研究的背景下，而且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提出让我们重新思考的，越南是一场战争，而不是一个国家。如果我们将越南视为东南亚大陆东部沿海地区的空间，那么我们必须记住，正如泰勒（Taylor 2013, 第398页）在吉伦提到的三部新历史著作之一中所强调的，越南在1802年才第一次成为今天这个形状。即便当时，阮朝的领土构成也只持续了半个世纪，法国的征服很快使其分裂。在这里，泰勒的“表面导向（surface orientations）”概念是密切相关的：地图、空间主张、语言、地名和其他统治工具可能误导我们认为越南是一个单质化的整体，从而掩盖了区域主义和多样化的群体认同。

因此，吉伦赞赏泰族在沱江地区及其周边区域争夺领土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与其他相邻民族以及崛起中的京族霸权的争夺。与此同时，他准确地指出了一个常见的分析错误，这一错误无意中呼应了一个强大的政治过程，即用民族主义术语将人口分类为“少数民族和多数民族”。他认为，想当然地使用这些简单化的术语，会将这些人从自己领衔的故事中剔除，从而“剥夺了他们在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能动性、能力和发言权”。对于这个恰当的陈述，我要补充一点，沱江地区是这种强大的民族主义分类的起源和应用的中心。1952年成为越南

西北区的区域占据了北越三分之一空间。该地区以相对较少的三十万人口对政府如何在全国范围内理解和管理其对象人口产生了的巨大影响。

最后，吉伦提出了“蛮荒之地（savage geographies）”这个有用的概念，以强调主体形成和领土构建中的血、汗和泪水。蛮荒的地理环境当然是越南的一个特征，但它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许多其他情境——比如殖民地或内战时期的美国和当代叙利亚——在这些情境中，暴力通过恫吓人们来实现对空间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他的最后一点听起来也是正确的：回想起来，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只是另外两场印度支那战争的序曲，它们都在我们现在称为越南的空间中争夺空间霸权主张。

陶娥对沱江地区的现状作了分析。她从当代农业政治（agrarian politics）的视角阅读我的论述，证实了吉伦的观点：即使是迄今为止在现代越南历史上被认为是“和平”的地区，仍有着激烈的斗争。陶作为一名先驱，领导了对越南水电开发的研究。水电工程从沱江地区扩展到北部山区，蔓延到邻近的老挝和柬埔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规划者和干部们已经驯服了强大的沱江本身，建造了一系列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的大型水电大坝和水库。

鉴于这些持续的发展，陶观察到沱江地区及其土地仍然具有地缘政治战略意义。换句话说，对越南西北部以及其中的斗争仍在继续，只是不再受到炮火侵扰。新一轮的领土重构正在那里展开，而这一次的结果也还不明朗。对于她敏锐的观察，我想补充的是，这些国家主导的进程使我讲述的历史变得更加模糊。越南在沱江地区领土建构的长期故事不仅被埋在档案中，现在还被淹没在水库下，被掩埋在工业种植园里。因此，这个以对国家发展的贡献而闻名的地区正在变得简单：仅仅是越南地缘体的附属物，几乎没有为其他想象、社会差异形式和本土风貌留下任何宝贵的空间。

（英文原文见 Scott Kirsch, Joseph Palis, Nga Dao, James A. Tyner, Pamela McElwee, Jamie Gillen & Christian C. Lentz (2020) Contested Territory: Diên Biên Phủ and the Making of Northwest Vietnam, *The AAG Review of Books*, 8:2, 110-121, DOI: 10.1080/2325548X.2020.1722490, 本文为开放获取，编译有节选）

策划：东南亚组

编译：陈俊彦

统筹审校：东南亚组